

徐陵为《玉台新咏》协助撰录者 及其《序》的撰作时间考

胡 大 雷

一、徐妃为《玉台新咏》撰录者又一佐证

先师詹锳《〈玉台新咏〉三论》据《玉台新咏序》叙一丽人,“细考文意,知一后宫贵人失宠之后,长日寂寥,此编(指《玉台新咏》)乃为其排遣而作”^①,我伸扬先师之论,作《〈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所“撰录”考》^②,主张《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所主持撰录。现又检得一条新的佐证材料。

兴膳宏先生《〈玉台新咏〉成书考》^③,将萧绎《法宝联璧序》后所列三十八位编者名单的排列次序与《玉台新咏》卷七、卷八作者的排列次序做了比较,发现三十八人中有六人见于《玉台新咏》卷七、卷八,且排列顺序完全相同。这很容易使人想到《玉台新咏》与《法宝联璧序》之间有什么关系?《法宝联璧》三百卷,《南史·陆杲传》称:

初,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陆)罩与群贤并抄撮区分者数岁。中大通六年而书成,命湘东王为序。其作者有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刘邵之《皇览》焉。

《法宝联璧序》中某些作者的排列次序应该是萧绎所为,那么,徐妃依萧绎《法宝联璧序》来为《玉台新咏》的作者排列次序,是极有可能的事。

二、先师詹锳对徐陵与徐妃关系的考证及《玉台新咏》撰作

我在《〈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所“撰录”考》一文中曾说,“徐妃也有自己的撰录班子”,这个撰录班子最重要的人物乃至首要人物应该是徐陵;文中还说到徐陵与徐妃的关系:据《梁书·元帝纪》,萧绎于梁武帝大同三年(537)“进号镇西将军”,《陈书·徐陵传》载,徐陵“迁镇西湘东王中记室参

①《〈玉台新咏〉三论》,原载《东方杂志》40卷6期,后收入先师詹锳《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齐鲁书社,1989年。文中多方论证《玉台新咏》是徐陵为徐妃解忧而撰录。

②《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③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1986年,第334页。

军”也在此年。《陈书·徐陵传》又载，太清二年（548），徐陵“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那么，自梁武帝大同三年至太清二年的一段时间，徐陵有在湘东王萧绎府中的条件。在此期间，徐妃编著《玉台新咏》而徐陵有所协助，条件上是允许的。

先师詹锳《〈玉台新咏〉三论》说：

且陵与徐妃皆东海郯人，陵在北齐与宗室书云：“吾宗虽广，未有骈枝，咸自驹王，同分才子。”“或复分齐处鲁，移魏居燕，瓜瓞虽遥，苏枝无远。”徐妃先世，如祚之、钦之、逵之、湛之、恒之，五代均以“之”字命名，而陵之祖亦名超之，疑陵与徐妃本出同族，特以昭穆既远，故史传不载耳。

先师又云：

……《玉台》六、七、八三卷，俱出当时文人之手，且其中多为东宫及湘东王府学士。再就并世作者籍贯而论，则何思澄、何逊、王僧孺、徐勉、徐悱俱东海郯人，鲍泉东海人，王筠、王训俱琅邪临沂人，刘孝绰、刘遵、刘孝威、刘孝仪、刘邈、刘令娴、王叔英妻刘氏俱彭城人，而徐君倩为徐妃之兄。且集中徐陵自作亦录四首，又有何曼才所作《为徐陵伤妾诗》二首，此虽取其多与徐妃相识，讽咏之际，或较亲切，而标榜之讥，殆难免矣。

先师的这两段论述明确了徐陵与徐妃的关系，既是宗族远亲上的，又体现在撰作《玉台新咏》上。

三、关于徐陵《玉台新咏序》的撰作时间

先师提出《玉台新咏》的编撰与徐妃有关系，刘跃进先生提出质疑，称“《玉台新咏》序中开头一段有关皇宫内苑的典故，与荆州刺史萧绎的身分不符”^①。刘跃进先生提出的质疑是对的，《玉台新咏序》中所述有关皇宫内苑的典故，确实与当时任荆州刺史的萧绎的身份不符。此处再进一步论证，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说《玉台新咏》是为宫中妇女提供的读物，也是与荆州刺史萧绎的身份不符的。

宫中妇女的读物可以有哪些呢？

其一，古代典籍。

《汉书·外戚传上》载：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汉书·外戚传下》又载：

（班）婕妤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颜师古注曰：《诗》谓《关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师》之篇，皆古箴戒之书也。）

^①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第91页。

《后汉书·皇后纪上》载：

（马皇后）既正位宫闱，愈自谦肃。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发。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

（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讎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官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元初）六年，（邓）太后诏徵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官，抚循诏导，恩爱甚渥。

《南史·后妃下》称后主沈皇后“唯寻阅图史及释典为事”。

其二，皇帝诏敕或皇后亲自撰写的后宫读物。

《梁书·张率传》载：

（张率）直文德待诏省，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千）餘条，勒成百卷，使工书人琅琊王深、吴郡范怀约、褚洵等缮写，以给后宫。

这是说奉皇帝之命撰作“以给后宫”。

《梁书·高祖丁贵嫔传》载：

及高祖弘佛教，贵嫔奉而行之……高祖所立经义，皆得其指归。尤精《净名经》。

这是说奉皇帝之命或顺皇帝之意而读佛经。《新唐书·后妃传上·文德长孙皇后》载：

后尝采古妇人事，著《女则》十篇，又为论斥汉之马后不能检抑外家，使与政事，乃戒其车马之侈，此为开本源，恤末事。常戒守者：“吾以自检，故书无条理，勿令至尊见之。”及崩，官司以闻，帝为之恟。

其三，皇帝主持创作的文学作品。

《陈书·皇后列传》载魏徵评述：

以官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

《南史·陈本纪下》载：

后主愈骄，不虞外难，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

那么，梁时谁有资格给宫中妇女提供读物？是梁武帝吗？《梁书·徐摘传》

载：

（徐）擗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擗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官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擗加让。梁武帝是个守旧派人物，他对“春坊”“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尚且不满意，他是不可能诏敕编一部《玉台新咏》这样的书的；一部如此的书，想要得到梁武帝的认可而在宫中流传阅读，也是不可能。

那么是萧纲吗？中大通三年（531）四月萧统溺水得病而亡，谁继为皇储，梁武帝迟迟不能定夺，照理应该立萧统长子华容公萧欢为太子，但因萧统为母发丧求道士埋蜡鹅及诸物厌祷镇灾之事，引得梁武帝大怒，《资治通鉴》卷一五五称：“上徵其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至建康，欲立以为嗣，衔其前事，犹豫久之，卒不立。庚寅，遣还镇。丙申，立太子母弟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朝野多以为不顺，司议侍郎周弘正尝为晋安王主簿，乃奏记曰：‘谦让道废，多历年所……’。”所以，萧纲继立为太子，承受着很大压力，做事非常小心谨慎。因此，萧纲为太子时，让人编一部宫中读物，似不可能。

萧绎时任荆州刺史，徐妃只有权利为本府人员提供读物，而没有权利为皇帝后宫提供读物。但是，事情后来起了变化。侯景之乱，梁武帝先被逼死，大宝二年（551）十月，简文帝被杀。第二年，梁湘东王萧绎大举发兵讨伐侯景，侯景被部下所杀，十一月，萧绎称帝于江陵，是为梁元帝，改元承圣元年（552）。

这段时间徐陵在做什么？《陈书·徐陵传》载：“（梁）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也就在这一年，侯景乱起，徐陵被拘留不遣。在萧绎大举发兵讨伐侯景、侯景被部下所杀的那一年，徐陵作《梁元帝劝进表》，表中有“太清六年（552）六月五日孤子徐陵顿首”云云，《梁书·元帝纪》载，是年八月，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魏使徐陵于邺奉表。

徐陵作《玉台新咏序》，应该是在作《梁元帝劝进表》以后。《玉台新咏序》中，对那位美丽的妃子极尽描摹之能事，盛赞其高贵出身，把其主持撰作的《玉台新咏》提高到皇宫读物的地位。梁元帝登基，《玉台新咏序》中称皇帝宫中之事就是自然而然的，否则，岂不是僭越？这种大肆张扬就隐含着梁元帝早就具备登基称帝的资格。进而，大肆张扬《玉台新咏》，亦有张扬自己参与撰作的意思，证明自己是新皇帝的老臣，增重自己被放还的砝码。

或说，徐陵被拘于北，有何心思为《玉台新咏》撰写序？《史通·核才》称：“孝穆在齐，有志梁史，及还江左，书竟不成。”徐陵被拘于北，无所事事，连梁史都有志撰写，何况一篇序言？撰写《玉台新咏序》的情况与“孝穆在齐，有志梁史”情形相同。再说被拘于北能否返南不可确定，写一篇序为南朝扬名，又为自己的宗族徐妃扬名且为自己扬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此序或可能是徐陵回南朝后为了缅怀先王先妃而作。序中视撰录此书者

为朝廷王妃,既是对自己这位同乡的缅怀,也是肯定了萧绎登基的合理合法。总之,此序应该是萧绎登基后的作品。至于说《序》为什么晚于作品,这在古代是很平常的事,如曹植《离思赋》有序曰:

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使从焉。意有怀恋,遂作《离思赋》云。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说:

此序文称曹丕为“太子”,按:建安十六年正月曹丕任五官中郎将,至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方得立为太子,序文盖事后所作也。曹植生前曾整理编订己所著作,命名为《前录》,今存《前录自序》可证。此《离思赋》序当自编《前录》时所撰。类似情况在曹植集中不少,如《叙愁赋》序:“时家二女弟,故汉皇帝聘以为贵人。家母见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赋。”又如《宝刀赋》序:“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龙、虎、熊、马、雀为识,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饶阳侯各得一焉。其余二枚,家王自仗之。”自称谓及语气皆可断定,诸序文为事后所补拟,非作赋当时所有也。^①

四、从梁时著书撰集者的署名情况论徐陵协助撰作《玉台新咏》

著书撰集者的署名体例有好几种情况,徐陵协助撰作《玉台新咏》还可以从梁时著书撰集的署名体例上看出。

第一种情况,梁时著书撰集者的署名,有把既参与撰作而又撰序者称之为撰者之例。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武帝《通史》四百八十卷,而《梁书·武帝纪》称梁武帝“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梁武帝仅“躬制赞、序”而称其作《通史》。又如,《隋书·经籍志》著录萧绎的作品有《研神记》、《补阙子》,而据萧绎本人在其《金楼子·著书》中所说,《研神记》是“金楼自为序,付刘歆纂次”;《补阙子》是“金楼为序,付鲍泉东里撰”。萧绎是著书的主持者,又撰序,故《隋书·经籍志》称萧绎所作。

徐陵为《玉台新咏》作序是世所公认的,前人多有指出,如唐人韩偓《香奁集自序》中就称:“暇思宫体,未敢称庾信工文;却谓《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徐陵给《玉台新咏》作序,历代著录又称《玉台新咏》为徐陵所撰集,那么,徐陵参与《玉台新咏》的撰集是可能的。而又因为徐妃秽名,于是都称《玉台新咏》为徐陵所撰集是情理之中的。

第二种情况,梁时留下来的著书撰集有一书两署名之例。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西府新文》十一卷,梁萧淑撰,它与诸诗集排列在一起,因此,《西府新文》也可能是一部诗集。萧淑,《南史·萧介传》中有述及,其云:

(萧)介性高简,少交游,唯与族兄琛、从兄眎素及洽、从弟淑等文酒赏会,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

^①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湘东王萧绎组织编写、撰录过多部著作,此部书人们又称是“梁孝元在蕃邸时撰”,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载: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迄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

“西府”,指湘东王官府;“新文”,指当代作家的作品。

如果《玉台新咏》的情况完全等同于《西府新文》,那么,《玉台新咏》既可署名徐陵所撰,又可署名徐妃所撰,后又因为徐妃秽名以及梁元帝在《金楼子》中对徐妃的厌恶之情,于是《玉台新咏》被署名为徐陵所撰,这是情理之中的。

第三种情况,多人撰作的作品集只称第一撰者或主持者的姓名。当时的总集,如《文选》,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引“或曰”称“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说“《文选》昭明太子萧统”云云,文末注云:“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而《梁书》、《隋书·经籍志》都称昭明太子萧统撰《文选》。又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梁简文帝《长春义记》,据《梁书·许懋传》:“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诸儒参录《长春义记》”。又如萧绎《金楼子·著书》著录的作品,还有一些萧绎注明是让他人代撰的或与他人合撰的,如《晋仙传》,注称“金楼使颜协撰”;《奇字》二秩二十卷,注称“金楼付萧赅撰”;《谱》一秩十卷,注称“金楼付王兢撰”;《梦书》一秩十卷,注称“金楼使丁覿撰”;《碑集》十秩百卷,注称“付兰陵萧赅撰”;《诗英》一秩十卷,注称“付琅玕王孝祀撰”;《长洲苑记》一秩三卷,注称“金楼与刘之亨等撰”。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著作都归在萧绎名下。

这些情况都是说,在当时,多人撰集的作品只称第一撰者或主持者的姓名;那么,倒过来说,假如以后从版本上确定了《玉台新咏》署名为徐妃或他人,也不见得就能否定徐陵协助撰录《玉台新咏》的事实。

五、徐陵作序没有为宫体诗“以大其体”的意思

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公直》载:

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

但这个说法并不可靠^①。假如萧纲晚年悔作艳诗,那就应该停止艳诗创作;假如有人撰录艳诗集如《玉台新咏》之类也应该制止才对,而为什么还要“乃令徐陵撰《玉台集》”呢?刘肃的意思是说萧纲坚持错到底,一不做二不休,而且还要让艳诗“以大其体”。但是毕竟刘肃有这样的说法,学者又探讨“以大其体”是什么意思。一般认为,这是将历代叙写男女之情的诗作都收录起来,为艳诗

^①关于刘肃说法的不可靠,刘跃进有很好的论证,见其《玉台新咏研究》中“诸说平议”一节(《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第68-69页),此处不赘。

即宫体诗找到历史根据,为宫体诗张目,扩大宫体诗的影响。^①

如果我们再仔细读一下徐陵《玉台新咏序》,可以看到,徐陵作序没有为宫体诗“以大其体”的意思。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明说此书的编撰目的,是为某一部分愁极无聊、烦闷的读者提供读物,《序》中云:

既而椒宫宛转,柘馆阴岑,绛鹤晨严,铜蠡昼静。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賒,谁能理曲。优游少托,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官之缓箭。轻身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欢尽于百骁;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可得代彼萱苏,微蠲愁疾。

这一部分读者就是愁苦、烦闷、闲极无聊的宫中妇女,甚或就是徐妃自己。《序》中称要以诗作“代彼萱苏,微蠲愁疾”;又称诗集编成后就是为了让这些宫中妇女“永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序》最后又说:

变彼诸姬,聊同弃日;猗与彤管,丽矣香奁!

前二句称这样的诗集确实可以让宫中妇女消遣时光了;后二句则进一步盛赞此部诗集。

从现代文艺理论的观点来讲,徐陵提出了一个文学作品的娱情作用的问题,但梁陈时并不认为这种作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徐陵的说法并非“以大其体”的做法。我们联系《文选序》对所录作品的说法,其既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又历数各体作品的优长,并称其“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就能看出真正的“以大其体”是什么样子的。如此相比较,可以说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并未对宫体诗“以大其体”。进而亦可见刘肃整个说法的不可靠。

那么,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所强调的只是徐妃为皇宫提供读物的政治意义以及自己在这种政治意义下的收益。

作者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穆克宏:《试论〈玉台新咏〉》,《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